

20

顾问 廖盖隆

世纪的中国

10

河南人民出版社

世纪的辉煌

张神根◎著

K27

Z162

20

顾问 余英时

世纪的中国 (10)

河南人民出版社

世纪的辉煌

张神根◎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世纪的辉煌/张神根著. - 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
2002.12(2004.1重印)
(20世纪的中国)
ISBN 7-215-05059-9

I. 世… II. 张… III. 中国-现代史-1989~
IV. K2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2)第015040号

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郑州市经五路66号 邮政编码:450002 电话:5723341)

新华书店经销 河南第一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 890毫米×1240毫米 A5 印张 16

字数 350千字 印数 3 001 - 6 000册

2002年12月第1版 2004年1月第2次印刷

定价:29.00元

序

章百家

中国的改革开放是一个连续不断的过程。1989年至1999年的10年,是这个过程承上启下的关键阶段。摆在读者面前的这部书记述的就是这个关键年代的历史。

在这10年的开端,由于国际国内的原因,中国经历了改革开放以来最困难的一段时间。但是,中国在逆境中显示出空前的应变能力,迅速恢复了稳定。随后,以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和邓小平南方谈话为契机,中国的改革开放进入了新阶段。在20世纪的最后几年里,中国的改革开放取得了一系列重要成果:初步建立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提前实现了“翻两番”的目标,加强精神文明建设,实施依法治国方略,稳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按照“一国两制”方针实现了香港和澳门的回归,建立起全方位的对外关系格局,中国人民解放军走上了现代化的精兵之路,中国共产党全面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在20世纪末人民生活从总体上实现了由温饱向小康的跨越。这些举世瞩目的成就,为中国跨世纪发展打下了最后一块基石。

这10年的历史是我们的共同经历,但要层次清楚、条理清晰地反映这样近的历史却很不容易。中国过去的史学传统是当代人不修当代史。然而,时过境迁,历史越修越近已成为一种世界趋势。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变化?最重要的是客观需要。当今世界变

化很快,人们需要及时了解这种变化,及时总结经验。正是这种需要,使得历史研究的范围从凝固的现实扩大到半凝固的现实,甚至延伸到目前还在时时变动着的现实。应当看到,这里不仅有需要,而且有可能。从研究历史的过程来看,一段历史,人们总是先勾画它的轮廓,建立一个初步的框架,然后再一点一点深入探讨。同时,当代人写当代史也有优势,这就是有实感,有切身体会。这是后人不可能具备的有利条件。至于当代人的认识是否准确全面,将会像历史一样,由后人评说。

本书的作者是一位青年学者,从事改革开放史的研究已有多年,这部书稿是几经修改才奉献给读者的。通过阅读此书,我们可以清晰地把握这10年的历史线索,可以比较全面地了解我国在各个方面所取得的成就,也可以认识改革开放的艰辛。人们了解历史的目的,说到底,是更好地把握现在,把握未来。我相信,当我们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奋斗的时候,重温已经过去的这段历史将会为我们增添智慧和力量。

目录

第一章 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的形成	(1)
一 不平常的春天	(1)
二 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的形成	(15)
三 平稳实现中央领导集体的新老交替	(21)
第二章 坚决维护社会稳定,进一步治理整顿	(28)
一 抓紧搞好党的建设	(28)
二 在全社会加强思想政治工作	(53)
三 对政治体制改革进行调整	(55)
四 进一步治理整顿	(67)
第三章 打破西方国家的“制裁”的斗争	(77)
一 国际形势的新变化和我国的外交对策	(77)
二 争取和平的国际环境和周边环境	(82)
三 打破“制裁”	(89)
第四章 进一步改革的努力和障碍	(96)
一 党和政府决定继续推进改革	(96)
二 改革开放的深化和扩大	(100)
三 治理整顿胜利结束	(112)
四 围绕深化改革、扩大开放的争论	(118)

第五章	确立邓小平理论的指导地位,开启改革开放新阶段	(129)
一	开启改革开放新阶段的宣言书	(129)
二	十四大作出三项重大战略决策	(143)
第六章	加快建立市场体制,提前实现“翻两番”	(165)
一	加强宏观调控	(165)
二	市场体制建设得到整体推进、重点突破	(183)
三	成功实现“软着陆”	(202)
四	提前实现“翻两番”,制定跨世纪发展规划	(207)
第七章	为改革和发展提供动力和保障	(220)
一	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	(220)
二	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大力加强法制建设	(241)
三	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	(265)
第八章	祖国统一迈出重大步伐	(277)
一	成功实现香港回归	(277)
二	澳门回到祖国怀抱	(301)
三	两岸关系在曲折中发展	(315)

第九章 跨世纪的部署	(323)
一 新的考验	(323)
二 高举旗帜,制定跨世纪纲领	(336)
三 组建跨世纪新一届政府	(345)
第十章 继续推进政治体制改革	(355)
一 实行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方略	(355)
二 机构改革取得重大进展	(359)
三 健全民主制度,扩大基层民主	(364)
四 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民主监督制度	(369)
五 维护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	(371)
第十一章 改革锐意攻坚,经济持续发展	(374)
一 体制改革打响攻坚战	(374)
二 确保经济持续、稳定、协调发展的努力	(392)
三 改革和发展取得巨大成就,积累了丰富经验	(404)
第十二章 面向新世纪的对外关系和军队建设 ...	(409)
一 积极构筑面向新世纪的外交关系	(409)
二 推进军队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建设	(447)
第十三章 全面推进党的建设	(461)
一 高举旗帜学理论	(461)

二	深入开展“三讲”教育	(468)
三	加大反腐败力度,加强反腐倡廉制度建设	(479)
第十四章	举国欢庆共和国五十华诞	(485)
一	战胜各种困难,不断取得新的胜利	(485)
二	举国庆祝,万民同欢	(500)
后 记		(505)

第一章

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的形成

一 不平常的春天

1. 少有的元旦社论

20 世纪 80 年代,全面改革展开以后,我国经济经历了一个加速发展的飞跃时期。从 1984 年到 1988 年,国内生产总值从 7171 亿元增加到 14928 亿元,国家财政收入从 1642.86 亿元增加到 2357.24 亿元,社会商品零售总额从 3376.4 亿元增加到 7440 亿元,外贸进出口总额从 535.5 亿美元增加到 1027.9 亿美元,实际利用外资从 27.05 亿美元增加到 102.26 亿美元,展现出非常好的发展势头。正如邓小平指出的:“这个期间我国财富有了巨额增加,整个国民经济上了一个新的台阶。”^①

然而,在加速发展的过程中,也出现了一些新的问题。经济上

^① 《邓小平文选》第 3 卷,第 376 页,人民出版社 1993 年版。

主要是物价波动较大,通货膨胀加剧,重复建设严重,经济发展过热。对1984年下半年开始出现的经济过热等问题,党中央、国务院未能及时采取措施加以遏制,经济过热的现象继续发展。1987年虽然提出财政信贷双紧方针,但又没有坚决加以贯彻,以致问题越积越多,突出地表现在通货膨胀加剧,社会生产和消费总量不平衡,结构不合理,经济秩序混乱。经济发展中深层次的问题主要是:社会总需求远远超过社会总供给,1984年—1988年,国民收入增长70%,而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214%,城乡居民货币收入增长200%;工农业比例以及工业内部比例关系严重失调。

除了经济工作的失误之外,更重要的失误在于:一度忽视思想政治教育,在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之间存在“一手硬,一手软”的现象。党内少数领导同志在推进改革开放,大力发展经济的同时,对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缺乏一贯性,忽视党的自身建设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思想政治工作受到削弱,在少数干部中滋生了相当严重的腐败现象,损害了党在群众中的威信和社会主义在人们心中的形象。社会上一些坚持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人异常活跃,他们利用群众对物价上涨和一些腐败现象的不满,把矛头引向反对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制度。国外敌对势力又积极推行和平演变战略,通过各种途径对中国施加影响。到了20世纪80年代后期,社会上出现了许多影响社会稳定的因素。

当时,在党内和社会上的一部分人中,对改革产生了两种截然不同的看法。一种看法是,改革开放把社会搞糟了,对改革开放产生了动摇。有人就说“文化大革命”是十年动乱,经济改革是十年乱动,“文革”是无政府主义,改革是无主义政府。另一种看法则认为中国还不具备搞社会主义的条件,只能退回去搞资本主义。这两种截然不同的看法,对正在进行的治理整顿和改革开放都产生了很大的冲击。对于改革中出现的问题特别是腐败问题,应该说当时的党和政府是比较了解和有所警觉的,也采取了一定措施。

只是后来发展到那种程度,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是始料未及的。

《人民日报》是党中央的机关报,它是中国最重要的报纸。它在每年的第一天都有一篇元旦社论,这篇社论是一篇很重要的文章。1989年的第一天,照例也有一篇元旦社论,但它却是一篇颇让人回味的社论。

这篇社论说,刚刚过去的1988年是难忘的。在这一年我们遇到了前所未有的严重问题,最突出的就是经济生活中明显的通货膨胀、物价上涨幅度过大,党政机关和社会上的某些消极腐败现象也触目惊心。对于在改革的第十年遇到的严重困难和问题,上上下下、党内党外绝大多数人缺乏足够的思想准备,一时间议论纷纷。

社论接着回答了人们最为关心的通货膨胀和腐败问题。它提出,要实现四化、振兴中华,惟有改革一途。倒退回去,重新回到封闭僵化的旧躯壳中,只能使中华民族重归贫弱,难以振兴。解决改革中遇到的难题,答案决不是知难而退、半途而废,而是认真总结经验,采取有力的配套措施,继续深化改革。要使改革进入更深层次,达到确立新体制主导地位的目的,需要解决一系列极其错综复杂的问题。改革的确是一场非常复杂、非常艰巨的革命,理想化的方案是没有的,不可能一帆风顺,不可能一改就灵。在我们面前,既没有现成的模式可搬,也没有现成的方案可循,只能靠我们自己循着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道路探索前进。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困难就是课堂,问题就是老师。暂时的曲折能够使我们学到很多在顺境中学不到的东西。当前最需要的是,认真总结经验,提高对改革的规律性的认识,从而坚定改革的信心,紧紧团结在党中央的周围,同心同德,振奋精神,艰苦奋斗。

在新的一年里,我们一定要进一步从严治党、从严治政,特别是在廉政方面采取更切实有力的措施,把消极腐败现象限制在最

小的范围之内,努力维护和提高党和政府的威信,增强党和政府的凝聚力、号召力,为改革开放的顺利进行创造更为良好、更为健康的政治环境,并推动整个社会的精神文明建设。

社论还说,历史不会被割断。1989年是1988年的继续,正面的、反面的,积极的、消极的,欢快的、沉重的东西,都不可避免地会继续。“一元复始,万象更新”,毕竟只是良好的祝愿。我们要通过团结奋斗,发展正面的、积极的、欢快的东西,使它们的比重越来越大;克服反面的、消极的、沉重的东西,使它们的比重逐渐降低。1989年一定会胜过1988年。

这篇社论,在这一关键时刻发表出来,意义非同寻常。它有一个明显的不足,就是对正在日益扩大影响的资产阶级自由化注意不够,整个社论的语调也是相当灰色和相当沉重的,蕴涵着深深的担心。但是,社论对推进改革的决心仍然非常坚定。

与此相对应,党和政府在1988年年底和1989年年初也先后对现实生活中存在的问题,有针对性地采取了一些措施。1988年12月召开了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讨论党和国家机关保持廉洁的问题。差不多同时,还召开了全国党员教育工作会议,主要研究新形势下如何加强、改进党员教育工作的問題。1989年1月27日,中央政治局举行了第十五次会议,讨论加强政法工作、稳定社会治安问题。还召开了全国纪律检查工作会议,强调领导干部要增强党性,提高纪律观念。总之,当时中央是在搞好治理整顿,坚持改革开放,保持社会稳定等方面准备采取一些措施的。但可惜一场严重的政治动乱,打乱了这些部署。

对中国存在着乱的苗头、动乱的因素,邓小平始终保持着高度的警惕。邓小平曾经在三个不同的场合,针对三个不同的对象,发表了三次谈话。这三次谈话,今天看来真是意味深长。

1988年9月,他在谈话中说,中央要有权威。改革要成功,就必须有领导有秩序地进行。没有这一条,就是乱哄哄,各行其是,

怎么行呢？不能搞“你有政策我有对策”，不能搞违背中央政策的“对策”，这话讲了几年了。党中央、国务院没有权威，局势就控制不住。他赞成边改革、边治理环境整顿秩序。要创造良好的环境，使改革能够顺利进行。中央定了措施，各地各部门就要坚决执行，不但要迅速，而且要很有力，否则就治理不下来。现在的局面看起来好像很乱，出现了这样那样的问题，如通货膨胀、物价上涨，需要进行调整，这是不可少的。但是，治理通货膨胀、价格上涨，无论如何不能损害我们的改革开放政策，不能使经济萎缩，要保持适当的发展速度。现在出现的问题是能够解决的，我们有信心。小错误难免，只要不犯大的错误就行了。我们要定一个方针，就是要在中央统一领导下深化改革。宏观管理要体现在中央说话能够算数。

1989年2月，邓小平说，中国的问题，压倒一切的是稳定。没有稳定的环境，什么都搞不成，已经取得的成果也会失掉。中国一定要坚持改革开放，这是解决中国问题的希望。但是要改革，就一定要有稳定的政治环境。中国正处在特别需要集中注意力发展经济的过程中。如果追求形式上的民主，结果是既实现不了民主，经济也得不到发展，只会出现国家混乱、人心涣散的局面。对这一点我们有深切的体会，因为我们有“文化大革命”的经历，亲眼看到了它的恶果。中国人多，今天这个示威，明天那个示威，三百六十五天，天天会有示威游行，那么就根本不让搞经济建设了。我们是要发展社会主义民主，但匆匆忙忙地搞不行，搞西方那一套更不行。如果我们现在十亿人搞多党竞选，一定会出现“文化大革命”中“全面内战”的混乱局面。“内战”不一定都是用枪炮，动拳头、木棒也打得很凶。民主是我们的目标，但国家必须保持稳定。

1989年3月，他说，我们搞四化，搞改革开放，关键是稳定。中国的问题，压倒一切的是需要稳定。凡是妨碍稳定的就要对付，不能让步，不能迁就。不要怕外国人议论，管他们说什么，无非是骂我们不开明。多少年来我们挨骂挨得多了，骂倒了吗？总之，中

国人的事中国人自己办。中国不能乱,这个道理要反复讲,放开讲。不讲,反而好像输了理。要放出一个信号:中国不允许乱。

邓小平的谈话,表明了党和政府的严正立场,一方面向一些人提出了严重警告,另一方面也为后来党领导人民平息动乱指明了方向,作了准备。

长期以来,一些西方国家的政治势力有计划地通过各种途径对社会主义国家实施和平演变战略。80年代末,东欧一些社会主义国家改革走入死胡同,开始出现动荡。与此同时,西方敌对势力也加紧对中国实施和平演变,使国内搞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人受到鼓舞。

1988年夏以后,搞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一些人如方励之等,攻击政府的声音越来越强了。他频频接受外国记者采访,公开否定四项基本原则,批评“反精神污染”,批评“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提倡“全盘西化”。

搞自由化的一个重要阵地上海社会科学院主办的《世界经济导报》,经常触及一些敏感的政治问题。1988年秋冬,北京一些高校里也有各种“研究会”、“讨论会”、“沙龙”等。搞自由化的一些人经常到这些地方发表演讲。

1989年1月6日,方励之致电邓小平,要求大赦政治犯、释放魏京生。

1月28日,方励之等在北京“都乐书屋”搞“新启蒙沙龙”活动。参加者除中国人外,还有一些美国、法国、意大利的驻京记者,共百余人。方励之在会上说:“现在中国主要是人权问题,需要行动。”

方励之等人将矛头对准党和政府,阴谋搞乱社会、颠覆社会主义制度的险恶用心昭然若揭。

在内外反动势力勾结、煽动下,西藏出现了新的不安定的情况。达赖计划在3月10日搞一次大规模的政治活动。3月5日,

在拉萨出现了骚乱。中央政府对拉萨果断实行了戒严。

1988 年秋到 1989 年春,政治上两种对立的看法、立场已经逐渐公开。

2. 从胡耀邦逝世到“四二六”社论

不希望看到的局面还是出现了。

1989 年 4 月 15 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沉痛宣告: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我军杰出的政治工作者,长期担任党的重要领导职务的卓越领导人胡耀邦,1989 年 4 月 8 日在出席中央政治局会议时,突发大面积急性心肌梗塞,经全力抢救,于 1989 年 4 月 15 日 7 时 53 分逝世,享年 73 岁。

胡耀邦的逝世在全国人民和青年学生中引起极大悲痛,纷纷举行各种悼念活动,表达深切哀思。与此同时,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却趁机利用人民对胡耀邦的纯洁感情,以及对通货膨胀、党内和社会上腐败现象的不满情绪,积极策划大规模的动乱,企图推翻中国共产党的领导,颠覆中华人民共和国。

本来 1987 年胡耀邦辞去总书记职务后,就有一些不了解情况的人为他打抱不平。而此时在首都的一些高等院校,更由于极少数反共反社会主义的阴谋分子长期策划和背后操纵,散布蛊惑人心的谎言,这对于已经十分紧张的政治形势来说,不啻火上浇油,悼念活动很快就演变成政治示威。

4 月 16 日、17 日,来到天安门广场悼念胡耀邦的首都高校师生及各界群众有数万人之多,人民英雄纪念碑前开始出现悼念的花圈。一些高校在悼念胡耀邦的同时,也出现了一些不署名的挽联、标语、口号、传单和大小字报,批评政府,反对腐败,为胡耀邦鸣不平。据国家教委 4 月 16 日统计,“北京有 17 所高校出现挽联、标语,大小字报约 500 份。其中,属正常悼念胡耀邦同志的占 80%,发泄不满的占 10%,攻击党和政府,煽动闹事的约占 10%”。

可见,初期正常悼念的仍占绝大多数。

但是,形势很快就发生了变化。在胡耀邦追悼大会前后,在很多大城市都爆发了大规模学生游行。

4月24日下午,中共北京市委召开常委会议,分析研究当前北京市形势。会议认为,北京市的学潮形势已经十分严峻。尽管大多数学生有推进民主的愿望,但就实质来说,这次学潮的矛头直接指向党中央,妄图推翻共产党的领导。如果这种情况任其发展下去,局势将变得更加严重,甚至不可收拾。为此,北京市委、市政府向中央提出建议:

(1)中央必须旗帜鲜明地对当前事态表明态度。

(2)中央报刊等宣传舆论工具,必须坚决服从中央的统一指挥,大力配合,造成强有力的舆论声势,扭转当前的被动局面。

(3)授权北京市委、市政府放手发动群众,组织反击。只要中央全力支持,我们将继续站在第一线,做好争取绝大多数群众,孤立少数敌对分子的工作。

(4)建议党中央、国务院尽快拿出几条过硬的措施,解决群众长期以来议论最多、反映最大、意见最集中的问题,最大限度地争取广大群众,赢得党心民心。

会议认为,大量的事实说明,以斗争求安定则安定存,以退让求安定则安定亡。如果不敢放手发动群众,不仅暂时的安定不可得,长期的安定更是不可能的。

4月23日,赵紫阳去朝鲜访问。4月24日晚8时,在万里的建议下,李鹏主持,政治局常委对事态的发展进行了分析研究。会议一致同意中共北京市委、北京市人民政府对当前首都形势的分析和所提出的四点建议。会议一致认为,当前的种种事态表明,在极少数人的操纵和策动下,一场有计划、有组织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政治动乱已经摆在我们面前。会议决定在中央成立制止动乱小组,同时要求北京市委和市人民政府放手发动群众,争取多数,